

作为不可能任务的现代性

□ 胡大平

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我们无意追求现代性的规范定义,而只是关心当前的事态及其给我们提出的难题。我们认同现代性研究的一个普遍立场是新事态需要对作为社会结构及其主导原则的现代性进行批评性反思。略有不同的是,如鲍曼所讲,我们认为这种反思不能脱离作为现代生活当事人的我们之主观体验。就批评本身并不提出现代性定义而同时必然涉及全部为现代性辩护的话语来讲,我们采取了最宽泛的现代性含义。在我们看来,在现代性概念或者现代性问题上,或许在过去曾经达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共识,但在今天,则不可能了。

从“创造性破坏”到“破坏性创造”： 现代性之液化及其后果

在现代性尚未达及其成熟状态之前,马克思便一针见血地指明了其“动荡”性质,并将之作为与过去的核心区分。由于这一点,我们必须追问推动现代性持续“动荡”的机制和力量,它们是否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赋予相似的现象以不同的本质。让我们还是以马克思作为观察的出发点。曾热情讴歌现代性的马克思,同时亦是对其发难的肇始者之一。“动荡”演变为周期性危机则是其显著征兆。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解决危机的方式,“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这就是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称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我们已经看到,这种创造性破坏过程一直持续着,但它却没有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送到马克思为其设计好的坟墓中。那么,在这一过程中,到底出现了哪些新的东西?在这里,我们不能展开全部资本主义的故事。仅仅就马克思提到的那两个方面的来说吧。在第一个方面,如果消灭生产力的方式不再如马克思时代通过消灭其成果的方式(如著名

的倾倒牛奶事件)来进行,而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限制生产力发挥作用,然后又将开发新生产力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那将如何?在第二个方面,如果把新市场开发到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比如说心灵方面,把彻底地利用旧市场发展成把市场本身当成商品,如今天的创投和金融创新,那将如何?这两个方面分别涉及马克思曾经提到但在他的时代只能想象而不能精确描述的“企业治理结构和商业模式革命”以及“万物商品化”问题。正是这两个方面的变化放大了马克思已经看到的资本界限,并因此把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过程推到“破坏性创造”过程。这是两个表象上相似但逻辑上相反的过程,前者通过危机打开新的可能性(在现代性的早期,通过对摧毁传统来打开新文明),后者则以新的可能性开发来阻止从而加剧既有社会结构的破坏性(在今天,通过“创新”来维系破坏性现代性)。这种转换不是瞬间完成的,它是19世纪70年代以来以美国现代企业制度(以管理权和所有权的分离为核心的治理结构)、技术革命和管理革命(泰罗制—后福特制)、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政府治理结构变革等为龙头的持续探索的后果。

正是在面对这个问题时,维希留和鲍曼等当代激进批判理论家成为新的预言家。在他们看来,我们面临着速度的暴政,现代性因此“液化”并把人类投入“液化的恐惧”之中。鲍曼说:“在现代时期里,运动速度和更快的运动手段在稳步增长,掌握了最为重要的权力工具和统治工具。”因此,速度、交通工具的使用和由此产生的移动的自由,一起构筑了权力金字塔。维希留提出速度学来阐明工业革命之后人类社会变迁不断加速的事态及其后果,从技术的角度揭示了今天我们面临的生存难题。较之于他,鲍曼的“液化现代性”视角更完整地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政治经济变迁分析,因此更接近于马克思。在此,我们以其作为参照对现代性之“动荡”及其提出的问题做一概括。

“解构即正义”：现代性之 超级化及其理论反动

如果现代人赖以生存的资本生产结构和他自身分享了相同的自我否定本质,那么作为社会生活和组织模式的现代性最终表现为疯狂也就不难理解,超级化乃至死亡终将成为其命运。我们不考虑现代性超级化的机制——无论是技术加速,还是万物商品化,抑或理性的自我膨胀等等,从后果的角度说,这是一个从外爆(现代性在空间范围和内涵上的扩大)到内爆(在空间饱和背景下的压缩并因此产生过度和异常增殖)的变化。鲍德里亚为我们描述了这一进程的特点,他强调:“我们的‘现代’文明经历了这个在所有层面上进行的扩张和内爆的基础,打着市场、经济与哲学人地普世化的旗号,打着法则与征服自然的普世性旗号。至少在某个时刻,它们无疑还经历了一种定向的外爆,一种渐进的受控能量的释放,这便是现代文化的黄金时代。然而根据一种猛增和加速的进程,这个外爆进程变得无法控制,达到一种飞快的速度和致命的广度,或者说达到了普世性的极限,它已经让可能的扩张场域达到饱和。”在鲍德里亚看来,在这一语境中,“物已经找到了摆脱困扰它们的意义辩证法之路:无限繁衍,自我强化,超越本质,不断极化以及变得淫秽”。所以,“触角、突起、多余、过度:这就是饱和世界里惰性的命运……速度在惰性中的复仇和控诉。在惰性通过加速膨胀的过程中,大众被一扫而光。大众是把所有增长投向厄运的多余过程。它是一条被可怕的结局弄短路的线路”。在鲍德里亚看来,在价值上,现代性已经变得虚无。他说,我们今天面临着一种比任何历史形式都要彻底和更重要的虚无主义,那是一种因为透明而无法判定的状态所不可避免地产生的“系统的虚无主义”,即对意义的破坏。当然,我们可以采取与鲍德里亚不一样甚至相反的价值判断,但却不能忽视这个问题:当现代性以“多余”“过度”方式“超越了”自身,在其后的“进步”过程中,我们将迎来什么?“更快、更高、更强”的现代性将创造出何种新的奇迹,这些奇迹将把人类带向哪里?我们仍然不得而知。可以确定的是,当代现代性不知不觉地走到极端,它有没有未来就成为一个问题。

“众声喧哗”:不能承受之全球现代性

现代性变迁的第三个显著后果乃是全球性的形成,它在多方位对现代性提出了挑战。首先,霸权销蚀而合作意愿减弱的无政府事态在全球层次上敞开了“类”的虚无性。从国际关系看,20世纪80年代,基欧汉如是强调:“要限制纷争并避免激烈的冲突,政府间的政策必须作为相互的调整。也就是说,合

作是必要的。”在今天提及基欧汉的判断,以其作为参照来观察世界局势别有意味。这是因为,现实出现了这种令人纠结的局面:特朗普政权越来越表现出不承担责任的霸权意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意识形态)霸权不断受到挑战背景下,一方面利用全球唯一军事超级大国地位为维护其霸权在世界各地不断重整,另一方面却不断地退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等等)。如果说这是一种“霸权非合作”趋势,它释放出何种信号?对我们理解全球化了的现代性又提出了何种问题?其次,随着现代化过程的扩大,欧洲之外加入其浪潮,在全球尺度上,确实产生了多种现代性要求以及多元现代性事实,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遭到批判的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化理念在全球化支持下变脸为取消时空限制的发展主义,这一点构成了多元现代性的共同基础。再次,当现代性达及全球范围,它也使推动这一过程的殖民问题复杂化了。在今天,不仅存在着所谓“后殖民”问题,而且殖民遗产正在形成或许改变现代性本身的“逆殖民”趋势。无论是移民、还是难民,不仅对于欧式民族国家来说是一种政治挑战,而且是对其现代性的挑战。最后,新的全球性并没有否定现代性,而是在全球尺度解放了其破坏性潜能——个体化与同质化的角力而产生的无规则流动。这种无规则的流动因为摆脱了此时此地的限制,亦因此解除了伦理的条件,从而表现为无节制的碰撞。在某种意义上,被假定为现代性升华的“后现代”恰恰就是它的文化表现。如果现代性乃是一种规划的旋律,那么,今天我们面临的则是这种规划失败之后的噪音,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如何谈论作为一种规划的现代性?

无论如何,在面对全球化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之视为人类从起点就注定要通过文化播化或者殖民而实现的同质性全球之宿命,也不能将之理解为旧有国际体系的强化,亦不能轻易地将其与多样性的统一联系起来。全球化乃是现代性的后果,但它改变了现代化的框架。马克思在预言现代性将随着强大的生产力进步而崩溃并在其基础上诞生全新的共产主义文明时,其直接理由乃是既有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的解放,并因此造成普遍的危机。在此,我们只是陈述这个确定的事实:现代性,作为事业,尽管已经腐朽,但它不是可以割掉的坏肉,而是扭曲的神经,只要不触及这个神经本身,反思性现代化或替代性现代化同样不足以承担今天的反思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路还是那两条:现代性自身的不断超级化,这是现实的欢快展开;或者,文明不断地责任化,这是迫切的要求。

■ 《社会科学战线》2019年第3期,约15000字